

电影的锣鼓

钟 惦 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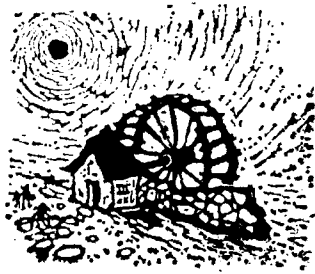


重 庆 出 版 社

I-247 621

电影的锣鼓

钟惦斐 著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·重庆

特约编辑： 仲呈祥

责任编辑： 王 飞

封面设计： 钟阿城

电影的锣鼓

钟惦斐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.75 插页：5 字数：185千
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,100

书号：10114·296

定价：2.05元

序

重庆出版社要出我一本书，已经说过好几年了。按我自己的设想呢，中国电影出版社印了我一本五七年前的陈货——《陆沉集》，书名佶屈聱牙，只印了六千本，肯定是要赔钱的。于是又把七九年以后至八二年前写的，另编了一本，叫《起搏书》，虽非陈货，但也不可能畅销。自发排到现在，已经两年，至今不知道它将是是个什么样儿。这几年又写了一些，按字数，已够另出一本了，但抽不出时间去整理它。上月重庆出版社来了两位编辑同志，重提旧事，我以为不可。因为八二年九月，四川出版社向我约过书稿，我是满口答应了的。但两位编辑说我是江津县人，如今江津县归重庆市管辖，言外之意，是说现官不如现管。我既是重庆子民，无论肥水清水，都一律不得泼到别的田里去。

呵唷呀！我也只好呵唷呀了。如今人们都在争着出《济公全传》和别的什么“英雄传”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争着要出我一本不大有人要看的书，再要令人扫兴，倒也近乎“驾篋装狗——不受抬举”了。于是坐下来商量怎么个出法？中国电影

出版社印的两本，是按年代编的，凡是属于这个时期的，全一锅煮。好处是对人对己，都有个检视作用。这一回呢？除了答应上海文艺出版社印一本《电影策》外，余下属于散文、杂文之类的东西，便收进这本书里。书名暂定为《江东草》。“江东”这层意思，大家是明白的。我也真的有四十余年不入夔门。开始是说在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的人，凡到一处，都必有指示，而我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，指示谁？后来就那个了，应该去的地方不是“江东”，而是渤海边上的劳改农场！以“江东”作书名，既不切贴，也太陈旧。值此颇费思量之际，忽得重庆来信，说他们认为书名以《电影的锣鼓》好。这层意思，我自然心领神会。比如北京的王致和臭豆腐，唯其臭得出奇，所以并王致和而声名在外。“锣鼓”之前，只电影圈里的少数人，知道有个钟某其人；“锣鼓”之后——正确地说是“锣鼓”挨批之后，大家才知道有个被“亲自点名”的人，而罪证又被收入大学文科的批判教材，人们这才对我“深刻”起来。过去读《阿Q正传》，不懂得阿Q何以在赵府挨打之后，连布衫也顾不上拿，一头扎进土谷祠，声名反被哄传出去，一夜之间，蜚声于未庄。直到自己幸得未能“大团圆”之后，才慢慢悟出人的出名也是可以有各种途径的。前些日子，《北京晚报》上似就发表过考据王致和其人的文章，说他上京赶考不幸落第，又无钱回原籍，穷居陋巷，连买了块豆腐也舍不得一次吃完，遂至发臭！孰知这王致和在纸上用心做的文章成了废品，而在豆腐上无意做的文章，倒使他由此发迹致富，誉满京都。怎奈我无此种福气，至今仍旧只得熬更守夜，写点应时小品。倒也博得一些读者，不计我曾马失前蹄，喜欢看看。只是这“幸得未

能的‘大团圆’”，对我未免苛刻了些。否则将不是重庆出版社找我，而是我抱着一堆断简残篇去重庆“打秋风”的。自一九七九年秋末到现在，不足七年我写了近百万字，而我不得染指电影的时间是二十二年，多于此数三倍以上！

不说了吧，反正人生不是这样的“呵唷呀”，就是那样的“呵唷呀”的。我原不真的懂得什么叫性格，蔫巴了许多年，倒也觉得，笔直地向“呵唷呀”走去，不计得失，毋论升沉，应该是正面或反面“教员”，历史是只看整数，不计零头的。

临末还须略加说明的是，《电影的锣鼓》已收入《电影策》，如今由于改变书名而入本书，已算一稿三用！如果有人报以冷眼，说我这是由“大团圆”而“大团结”（指人民币），我也没得话说。又，我既已出过两本书，这次又将两本书中的一部分篇章，编入此书，总的体例仍以散文为主，加以近三年新写的部分。其中有冷饺，但不全是冷饺。如果说“文如其人”，我倒不是个总给人吃冷饺的，甚至连一个字也不肯。借《电影的锣鼓》和《电影策》出版的机会，把“一锅煮”的出版体例也变一变，按文章的性质分类，对读者，或者也不无好处。

全书编务由青年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同志一竿子到底，还有上面提到的《电影策》也是如此。如今有些事情，总是很令人“呵唷呀”的。收入本书中《人的价值》，荣幸地为《中国新文艺大系·散文卷》采用，但题目却被换了一个，改为《铁骨铮铮》！最后注明文章出处，又把《四川文学》改作《红岩》！样书送来了，令人大吃一惊！前者很可能是“人的价值”有点犯忌，但我作为作者，是笔直地向这犯忌处走去的。因为我不相信人是没有价值的。这不相信，又是作者亲历了许多事件之后，

认为人的无价值论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比如张春桥这个人，自我三十年代末认识他以来，不仅是我，而且是我们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都常用鄙视的眼光去谈论他的。当时他是华北联合大学政治部的宣传科副科长，每年的中心工作是从“三八节”到“十月革命节”布置会场，挂领袖像（顺序是：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、聂荣臻），挂宣传画，这倒也是谁干这份差使都一样，值不得提。值得一提的是他把校长成仿吾在大庭广众中直称为“我们的妈妈”，而且拿腔拿调，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！后来在上海，也是言必称“柯老”，我问他干什么？他回答是“帮柯老干点杂事儿”。张春桥这种“人的价值”观，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“百家争鸣，一家作主，最后听江青同志的”！

因此，《人的价值》写的固然是另一个江津人，但要阐明的却不止于朱讯。我们党培养了朱讯这种“铁骨铮铮”的人，也培养了“有奶便是娘”的张春桥辈。历史上有些人历千百年而无定论，但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，我们就黑白分明地画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忠魂和鬼魅。逝者如斯，难道我们对人的价值还能有什么怀疑么？“工具论”之不足取，在于工具自身对使用它的人无所选择，把殉道者钉上十字架，和把猪狗钉上木桩，对锤头都是一个样子。“子弹不长眼睛”，长眼睛的是人。

“有奶便是娘”之所以为贬词，是它还不能把人和一般的哺乳动物分别开来。现在人们说，一个人正直就不易，而正直是人的起码价值。连起码价值也没有，哪里还能说到“铁骨铮铮”？

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凌晨



本书《电影的锣鼓》一文获罪次年，作者徙流渤海，遗四子一女于吾妻张子芳，伊受辱于莫名，罹难于无期，携家泄尾于塗中，窘迫更胜于作者。

今略志之，并置八六年十月与之同游小山三峡时小照一帧于卷首。

作者

目 录

序

人的价值.....	(1)
赵丹绝笔.....	(11)
悼金山并追念孙维世.....	(14)
文学的执拗.....	(21)
创作热情有违于艺术规律者不祥.....	(26)
他会对我挥动拳头.....	(31)
《父亲》与电影.....	(37)
传播精神文明者必须具有高度精神文明.....	(42)
岂可为“副作用”失色.....	(45)
袁沙和他的《阿Q正传二百图》.....	(48)
✓ 电影的锣鼓.....	(53)
影奖随笔.....	(60)

✓ 写给《中国电影时报》创刊号·····	(65)
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对演员修养的几点提示·····	(68)
看胡芝风演《李慧娘》·····	(78)
致胡芝风·····	(82)
论谢芳——为谢芳《银河寻踪》一书作序·····	(89)
初论张瑜·····	(97)
关于表演艺术的通信·····	(104)
在上海会见张瑜·····	(110)
舞蹈的第一要素是美·····	(117)
无与伦比：《扒马褂》·····	(119)
可贵是真情·····	(124)

✓ “何必曰利？”·····	(126)
略谈“拿顶”·····	(128)
谈情说爱·····	(130)
被“革”掉了的“文化”·····	(133)
启事：我有失之，未敢忘之·····	(136)
有个莫里哀该多好！·····	(139)
告白苏剑林·····	(142)
王贵科出殡·····	(144)
略论“中心工作”与“常数”·····	(146)
└ 我还没有开化·····	(149)

《陆沉集》题记·····	(153)	✓
《起搏书》序·跋·····	(157)	

《电影美学：1982》后记	(171)
《电影美学：1984》编后记	(178)
《电影美学问题》序	(182)
《外国电影故事》(第一辑)小引	(185)
《何迟相声集》序	(188)
《电影〈骆驼祥子〉的设计、施工和 完成图谱》序	(192)
诗的融入——序凌文远诗集《乡情》	(208)
不平静的文学——《张弦电影剧本集》序	(219)
回延安唱歌	(225)
歌词情	(230)
故乡的清明节	(244)
从天心函到延安	(249)
白云下面是故乡	(256)
答乡中问	(262)

人的价值

《四川文学》为“天府笔会”约我写稿，我虽不以为“月是故乡明”，却也总是惦记此事。并动手写过几次，但都不成。如今我已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北方人，在成都的生活只两年，并且是个俗人，连丞相祠堂和杜甫草堂都没去过！当时听说有个“不醉无归小酒家”，“小酒家”嘛，名称又如此动听，很想能有机会去观光一下。后来才知道一碗豆芽汤要四块钱，这是万不可去，也去不起的。

说实在的，成都为我留下印象最深的，倒是少城公园南门外的一家小饭铺。只两张破旧的桌子、几条板凳，只消花一个铜板，便可以买到一碗“冒儿头”。一碟泡菜是免费的。没有汤，但桌上摆了个用棕皮保温的大茶壶，只管取用，不取分文。店伙计只一人，盛过饭，便坐在一条临街的独凳上，观看街景。于是我想以“冒儿头饭庄”为题……

这样写了。但写这些有什么意思！

我困惑了。

困惑以交稿日期的逼近而近乎茫然！这时我收到一个年轻

人从江苏寄来的信，是讲我在江津中学的同班同学杨子波的。子波之死已近八年，他的死，曾轰动上海：亲生女儿杀死了曾经是市委常委会的父亲！但当时在北京能听到的消息，内容互相歧异。一些和子波相识的旧友，皆极震动，究竟如何，全说不清。

反正子波是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是他的女儿用铁器从背后猛击头部！女儿何以要杀害自己的父亲？说不清。

女儿呢？被作为凶手枪毙了。时间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一日，即张春桥等人总崩溃前夕。

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事情，这是实在的。既非“有攻城野战之功”，文学上也是一败涂地。更使我感到负疚的是我之“涂地”，还直接牵涉到子波，和另一个在小学时代的同学蹇俊德，直至我们三人在江津中学时的国文教师赵其文。我们三人是一九三七年冬同去延安的，同时进入抗大。快毕业时，他们从抗大转入马列学院，子波学政治经济学，俊德学哲学。

之后，子波改名朱讯，俊德（彦兮）改名文山。

三九年时，朱讯随徐海东同志南下，文山去贺龙同志率领的一二〇师。直到全国解放之后，才在北京重新见面。五六年我去上海了解电影情况，住在朱讯家约一个月。次年我以《电影的锣鼓》被点名。朱讯从青岛疗养地回上海前，专程来北京看我，住在我家。在此前后，我们写过很多信，直至五七年八月《人民日报》用头版发了关于我受批判的消息，朱讯才不再有信给我。

即便如此，已经为时太晚。《电影的锣鼓》的阴影，已经

笼罩在作为上海市委常委分管经济工作的朱讯头上。后来便以此故离开市委，在家赋闲一年。他以善谈见称，此时却闷坐终日。这个从来就把自己和党视为一体的人，虽然不致得出“人生若梦”的结论，但革命到这般田地，却也近似若梦人生！我曾说在延安时代的窑洞里，即使有最富于想象力的漫画家，甚至是狂妄的精神病患者，也难于设想出往后的图景。六一年在国棉厂任厂长。六二年在供销合作社任书记。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”一起，他就成了“漏网右派”！罚作龙华果品冷藏库的看门人。

写信给我的年轻人，其时是他家孩子的朋友，很得朱讯和他妻子路明同志的喜爱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起，许多年轻人都处于极度兴奋状态时，朱讯对他说：“小鬼，破旧立新是对的。可是，不能把凡是旧的事物都当作丑恶、落后、反动的东西。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，是国家的财富，任意毁坏太可惜了。共产党可不是六亲不认，不是不要老祖宗。同时，也不是凡是新的东西都代表进步、光明，都是值得欢迎的。何况今天是新的东西，过些日子也会旧的；今天看来是对的，也还要经过实践证明是否真正有生命力，也还有可能是不对的或者不完全对的。”当闹腾冲“旧市委”，赶工作队，斗当权派，揪“黑帮”时，朱讯又愤然地对他说：“这叫‘革命’吗？‘革’的什么‘命’！这几年国家建设刚好一点，为什么要搞得你斗我，我整你，民族不团结，家庭不和睦，人人自危，工人不干活，农民不种地，学生不上课，究竟于党、国家和人民有害还是有益？我想不通，为什么‘文化革命’搞成了‘放纵社会造反’，为什么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和

争论，一夜之间就成了两条路线、两个阶级、两个司令部你死我活的斗争？也许我老了，看问题有些僵化，你年轻，要多想想，多学习，千万不要盲从，不要人云亦云。要真正弄通弄懂马克思主义可不简单。”

这就命中注定了朱讯要成为上海旧市委中“最顽固的家伙”。多次被批斗，却从不低头。在一次会上，王洪文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有的人就是假共产党，披着共产党的外衣，干的国民党的勾当。”朱讯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：“谁是国民党？你们要搞垮共产党的上海市委，干出了国民党想干干不了的事，你们是什么党？我们这些人跟毛主席南征北战，打江山，保江山几十年，是革命党，不是黑帮。是专门同反共的人打交道的！你们骂我们，抓我们，没啥了不起，总有一天要同你们算帐的！”马天水检举曹获秋等同志在市委讨论财贸工作时的“错误言论”，朱讯严肃地说：“你要实事求是，不要瞎说，瞎说是要负责任的。我们大家都举了手，表了态的。要错也有你一份，不要推得干干净净！”

“一月风暴”之后，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要搞“上海人民公社”，毛主席则提出“三结合”，他们又赶紧在原市委部局长以上干部中物色人选。不知是什么人提出“朱讯在新四军里长期做干部工作，如果‘争取’过来，影响很大。”有人认为“朱讯又硬又臭，弄不转来。”有人又认为“朱讯当过市委常委，后来撤了，现在给他个市革委副主任，他会干的。”王洪文派人找朱讯，遭到断然回绝：“你们把我朱讯看成什么人？我朱讯绝不同张春桥、徐景贤、王洪文这样的败类为伍！”

朱讯于是被关押。

在关押中，朱讯一次又一次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神话。一次，有人来要他交待徐海东反党反毛主席的“罪行！”

一九三九年，朱讯是作为徐海东同志随身参谋南下的。途经西安，胡宗南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刁难徐海东同志，直到上了火车，国民党的兵痞们仍千方百计地找岔子。朱讯气不过，等火车启动，便狠狠揍了他们几个耳光！这事情我去上海时，他便对我讲过。因此在关押中的朱讯，对来人眉飞色舞地大大的赞扬了徐海东同志一通，说：“徐海东同志凭什么反党反毛主席？他反党，还创建什么红二十五军？他反毛主席，还同中央红军会哪家师？他要是反革命，为什么还身抱重病，不要命地亲赴前线指挥作战？徐海东到底是什么人，你们到他战斗过的地区问问老百姓嘛！不是说要相信群众吗？”还有一次，调查人要他揭发曾山的问题，他说：“曾山没有问题，他当华中局和新四军的组织部长，他有问题还行！”后来又向朱讯调查陈毅，硬说陈毅是“黑司令”，“只会下棋，不会打仗”，朱讯听了，拊掌大笑而言曰：“陈毅不但是红司令，还是红透了的司令。皖南事变以后，陈毅为重新组建新四军和华东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他的功绩谁也抹煞不了！陈毅亲自指挥了华东战场的几个著名战役，谁说他不会打仗？”又一次，中央专案组要朱讯交待谭震林是“叛徒”，朱讯勃然大怒，将手中的茶杯向他们砸去，说：“你们这是栽赃陷害！^①卑鄙！可耻！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搞了十年，其实只办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向全国直至全世界宣布，中国革命是依靠一些叛徒、特务、工贼、内奸、土匪、大军阀、野心家们搞成的；天下的怪事，还

有什么比这个更加不可思议？如果千百万阵亡的红军战士、八路军、新四军战士，一旦被告知他们的牺牲，不是为了庄严的共产主义事业，而只是为一些败类们卖命送终，他们的在天之灵，能够有一时一刻的安息么？他们不会含怒于九泉么？

愚蠢！

一次，当这位年轻人向朱讯谈李秀成之死时，他说：“说李秀成是叛徒，他为什么早也没叛变，晚也没叛变，浴血苦战，出生入死，只身被擒，已经知道必杀头无疑才‘叛变’？这不合逻辑！对瞿秋白也是这样。一个人在临死前可能对一生有很多联想，有很多总结性的认识或‘觉悟’，即便其中有些是不妥当的，但与叛徒完全是两码事。”

关于江青，朱讯五七年春来北京时，他曾问起五一年时我和她去山东的情况。我说和此人是无法共事的，早晨起来是A调，到了晚上又升为B调，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。而她的曲谱，总是和她的实际演唱能力相去甚远。而她似乎还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点，不以为失，反以为得。在山东期间，一路上不是指责这个，便是呵斥那个，事情都涉及到中央文化部的一些领导人。一次我实在忍不住，便以党小组长的身份和她谈了一次，说“你有些意见，还是回北京再谈的好。和我们同来的有省委和聊城地委的同志，他们年轻，也不知道北京在文艺上的一些工作情况……”，她顿时涨红着脸，说“我考虑考虑你的意见”。第二天，才表了个态：“我接受你的批评……”而我从此多事！朱讯说在马列学院时，他是江青的小队长，一次看江青演什么戏，没等戏完，便带着他的小分队走了，以后便